

稻改、粮食减产与饥荒

——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

葛 玲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摘要】在近年来的饥荒研究中,不同区域之间的饥荒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几种较具影响的解释。本文主要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通过分析稻改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揭示其在皖西北饥荒中的作用。稻改的影响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多占用劳力影响了其他作物的生产,降低了粮食单产;二是计划面积的难以落实导致大量耕地荒芜,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二者使得1960年前后的粮食总产降到了历史最低值,这是皖西北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稻改;劳力占用;荒地;粮食减产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5-0058-13

Replanting Rice, Reduction in Grain Output and the Chinese Great Famine

GE L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Chinese Great Famine and the causes of this situation had become a focal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several influential interpretations have already formed.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planting rice and the famine in the Northwest Anhui provinc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eplanting rice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famine. This effe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replanting rice occupied most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it resulted in the decrease of grain yield. Secondly, the replanting rice led to some of farmland was deserted, and this led to a reduction in the sown area of grain. These two points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mine in the Northwest Anhui province.

Keywords: replanting rice; labor occupancy; abandoned land; reduction in grain output

一、问题的提出

1959-1961年的中国饥荒,一直是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围绕饥荒时期的人口死亡及其成

【收稿日期】2016-06-18

【基金项目】本文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葛玲(1979-),女,历史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史。

因,学界已有了相当充分的讨论^①。在近年来的深入研究中,不同地区之间的饥荒差异开始受到普遍关注,针对其原因形成了几种较具影响的解释。龚启圣和林毅夫以不同地区的“解放时间”为据,指出解放越晚的地区政策越趋于激进,饥荒也相对严重,进而建立了“解放时间”与饥荒差异间的因果联系^②。龚启圣和陈硕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激励机制对官员的政治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导致各省饥荒差异的主要原因^③。陈意新通过比较饥荒在安徽和江西的不同表现,指出了农业劳动力、农村留粮和省级领导的赈灾措施对地区间饥荒差异的影响^④。曹树基则把饥荒置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通过分析不同地区间的饥荒历史记忆,解释了府级政区间的饥荒差异^⑤。在无为饥荒的研究中,刘诗古先是以水路交通线解释了各公社间的人口死亡差异^⑥,后又在白鹤、三益两大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队干部的能力和身份、征购后的农村留粮及返销情况、微地貌下的代食品生产进一步影响到各大队之间的饥荒差异^⑦。

应该说,饥荒表现的地区差异,使任何有关饥荒产生的整体解释都会遇到地方经验的挑战,区域性的饥荒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基于地方经验得出的解释常会面临普遍适用的难题。仅以安徽为例,皖南、皖北之间巨大的地理条件差异,使相同的政策在两地产生完全相异的后果。如刘诗古在其无为研究中,就特别提到了“茬口改制”的问题。“茬口改制”,是1950年代安徽在全省推行农业“三改”的重要内容之一^⑧。“三改”在皖南多表现于“单改双”的“茬口改制”,皖北则以“旱改水”的“稻改”为主。刘诗古指出,虽然无为官方认为“茬口改制”对饥荒的影响甚大,但他的研究却发现这样的认识和事实并不相符。

在皖北地区,饥荒后的各种官方报告,同样视“稻改”为重要原因之一。1961年,临泉县委书记赵宋就指出,“过去栽稻子要求过紧,去年5月28日麦子熟了,叫收麦停下来,用60%的劳力去大栽三天稻子,由于瞎指挥,使麦子受到不少损失。”^⑨同年初,该县老集区委书记金福胜也认为,“从58年、59年和60年三年大部分劳力投入水稻,影响了其他的农作物。”^⑩即便是事过多年的总结,仍坚持“稻改”

① 关于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现状,可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范子英、孟令杰:《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载李文主编:《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李庆刚:《近几年“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陈硕:《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徐涛:《美国关于1959-1961年中国饥荒研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James Kai-sing Kung and Justin Yifu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2003, pp.51-73.

③ James Kai-sing Kung, *The Emperor Strikes Back: Political Status, Career Incentives and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2, pp.179-211, 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uo Chen,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5, 2011, pp.27-45.

④ 陈意新:《安徽和江西大跃进一大饥荒的比较研究》,载宋永毅:《大跃进一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594页。

⑤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⑥ 刘诗古:《水路交通线与无为县的“大饥荒”(1959-1961)》,《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⑦ 刘诗古:《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学术界》2012年第4期。

⑧ “三改”政策提出时主要针对的是沿淮及淮北地区,1954年沿江地区开始将双季稻种植列入“三改”实施计划,使其成为一项全省推广的政策。详见《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36-337页。

⑨ 赵宋:《在县委扩大会议的补充检查》(1961年9月7日),临泉县档案馆藏档案:3-1-316。

⑩ 金福胜:《关于整风的检查报告》(1961年1月11日),临档:3-1-333。

是饥荒发生的重要因素,如《阜阳地区志》的编者即认为,“在强行推广种植水稻期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不讲成本核算,造成严重浪费,同时影响了其他农作物的耕种管理,造成减产。^①”这样的说法是反映了皖北饥荒的历史真实,还是如刘诗古在无为的发现一样并不属实?如果所述为真,在无为饥荒中并非关键因素的“三改”,为何会成为皖北饥荒的主因?如果所述不实,皖北饥荒又因何如此之重,是否和皖南的无为有着相似的逻辑?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建立在皖北饥荒的经验研究基础上。

从现有的研究看,安徽饥荒整体上虽较为严重,但各地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如在曹树基^②、杨继绳^③和冯客^④等人的研究中,阜阳地区就是安徽饥荒的重灾区,非正常死亡人数居全省首位,多年后的官方回顾给出的数据则是全区病(死)饿死人数超过240万^⑤。而据曹树基的研究,即便在阜阳地区内部,各县之间的饥荒差异同样很大,其中阜阳、临泉、太和、亳州^⑥和界首等县较重,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都超过了80%,其余各县则在50%上下,基本处在全省平均水平^⑦。另外如刘诗古的研究一样,县域内各公社之间的饥荒差异,同样存在于皖北各地。这样的微观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也需要基于地方经验的深入分析。

在皖西北稻改的研究中,笔者曾以临泉的小王庄为例,讨论了稻改对1959年该村粮食减产的影响,并据此判定稻改促成了饥荒的发生^⑧。这一结论不仅可以推广到皖北饥荒区域,还可讨论稻改与县际或公社灾荒程度差异之间的关系。本文即以阜阳地区为例,讨论稻改和县际饥荒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而以临泉县为例,分析稻改和不同公社之间饥荒差异的关系。

二、稻改与劳力的占用

1953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了在全省推行“农业三项改革”的意见^⑨,这是皖北稻改的政策起源。由于稻改最初的定性是治淮除灾^⑩,因此肩负治淮重任的阜阳地区就成了稻改政策的实施重地。1956年后的稻改诉求虽由治水防灾转变为粮食增产^⑪,但以“旱改水”为主要表现的稻改仍集中

① 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②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5-66页。

③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256-338页。

④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郭文襄等译,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284-286页。

⑤ 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回顾本区饥荒时,并未严格区分病死、饿死,只笼统称之为病饿死人数超过240万。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征途——阜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汇编》,安徽京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7年,第155页。曹树基研究得出的阜阳人口死亡数194.5万人虽低于党研室的数据,也是全省最高。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65页。各种回忆资料和口述史调查也反映了阜阳饥荒的严重,如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杨德春:《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牛犇:《大饥荒口述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

⑥ 亳州原称亳县,是阜阳地区管辖县之一。1986年国务院撤销亳县建制,设立亳州市(县级)。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亳州市志》,黄山书社,1996年,第33页。

⑦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479页。

⑧ 葛玲:《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1950年代皖西北稻改中的政府与农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二),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0-234页。

⑨ 《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⑩ 曾希圣:《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1954年1月1日),《曾希圣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⑪ 关于皖北稻改政策的变化,可参见笔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皖西北稻改运动的初步研究——以临泉县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于皖北尤其是阜阳地区。

阜阳地处黄淮海平原南部,虽然有着悠久的稻谷种植历史,却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种植的习惯和传统。1949年全区稻谷种植面积6.1万亩,仅占同年粮食播种面积的0.19%,1951年土地改革后种植面积虽有所扩大,也只达到13万亩^①。由于辖区部分县市缺乏水稻种植经验,因此在初期的稻改任务分配中,地委的考虑主要是治淮需要。如1954年的稻改任务中,濒临淮河的凤台、阜南、颍上分别为5.2万亩、3.0万亩、2.0万亩,合计占全区当年任务的78.7%,其余各县从几十亩到几千亩不等,距离淮河较远的亳州只有20亩^②。

1956年稻改诉求发生变化后,临淮的地缘因素不再是地委分配任务的主要考虑。如亳州,不仅远离淮河,且无水稻种植经验,1956年水稻种植任务达到1200亩。1958年以后,随着全区稻改任务的不断加码,治淮和经验结合的任务分配原则被完全抛弃。在1959年阜阳地委制定的400万亩水稻改种计划中,阜阳65万亩、临泉50万亩、亳州47万亩、首太46万亩、阜南42万亩、颍上42万亩、涡阳38万亩、凤台38万亩、蒙城32万亩^③。与1954年的任务相比,临淮的凤台、阜南、颍上三县稻改占比由最初的78%降至30%,原本较少的阜阳、临泉、亳州、首太等非临淮县则大幅攀升,四县合计占到全区稻改面积的52%。这种变化表明,大跃进时期的稻改已不再顾及水利条件和种植习惯。如亳州,虽是全区年降水量最少、蒸发量较大的县份^④,稻改基础并不理想,但1959年的任务仍高居全区第三。

客观水利条件的不足,使各地只能以人为方式解决稻改的用水需要。同期的河网化运动,就和稻改用水相关。1958年,临泉县长刘一樵明确指出,河网化工程的土方量是按照稻改需水量核算的^⑤。由于土壤保水条件差,插秧后需投入大量劳力保证稻田需水。这些都会占用大量农业劳动力,对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影响。1961年,曾希圣认为稻改“搞多了”的主要依据,就是“没有计算劳动力”,使不断扩大面积的稻改超出了各地的劳力承受限度^⑥。

这种劳动力紧张,自1956年稻改面积扩大后就一直存在,并在1959年集中凸显。根据1959年临泉县委的核算,小麦每亩需工20.1个,水稻需工106.5个^⑦。两者间的巨大差距,必然导致稻改挤压其他作物生产劳力的结果。1959年4月梁文生在临泉胡集调查发现,在畜力不足的情况下,为完成稻改任务,只能占用更多人力资源,并以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弥补人力不足。梁文生称:“我们的意见是劳力代畜力,准备用人力来拉犁活稻田,以解决畜力的不足。对劳力不足,当前的办法只有提高劳动强度,在不影响群众8小时睡眠的情况下,夜晚突击春耕春种。”^⑧

1959年临泉稻改面积33万亩,1960年计划面积猛增至58万亩^⑨。面积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力投入。1960年6月13日的临泉县委农工部电话会议材料显示,全县稻改劳力投入最高时达28万人,^⑩19日的县委跃进会议则提出,全县“稻田保证安排60%的劳力,上工21万人,3万人保稻,5万人上

①《阜阳地区志》,第191页。

② 阜阳地委:《关于改种水稻初步计划》(1953年11月25日),临档:3-2-34。

③ 阜阳地委:《关于1959年稻改计划和增产措施的通知》(1959年2月14日),临档:3-2-165。

④《阜阳地区志》,第115页。

⑤ 刘一樵:《关于增加春季农田水利工程任务的意见》(1958年2月25日),临档:69-2-47。

⑥ 曾希圣:《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4月23日),临档:3-2-245。

⑦ 临泉县委:《关于劳力使用算账的参考材料》(1959年1月29日),临档:3-1-182。

⑧ 梁生文:《胡集乡八一大队生产和食堂情况报告》(1959年4月23日),临档:3-2-180。

⑨ 临泉县委:《稻改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59年10月20日),临档:3-1-219。

⑩ 临泉县委农工部:《电话会议材料》(1960年6月13日),临档:121-1-46。

水,8万人活田,5万人拔秧插秧。”^①夏稻插秧时正值夏收秋种的关键期,60%的劳力上稻田,对其他作物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如1960年下放至刘火庙的地委工作组就报告,该队“1960年稻改155亩,抽70%劳力,实际参加500余人,群众求抽出部分劳力锄秫秫未允,378亩秫秫一锄未锄,结果造成减产,稻子也减产三万五千余斤。”^②

1960年6月,临泉县委副书记陈俊岭到河南参观,即发现当地因为没有稻改,其他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得以“正常进行”,“由于他们未进行稻改,目前所有劳力除打场外,大部分劳力都投入春播作物田间管理。所以他们田间管理做得很好。”^③与此相反,临泉的单桥,则“由于稻改投入的劳力多,并影响了其他作物的生产,去年栽红芋320亩,因劳力抽不开,就有160亩,是晚栽的,结果每亩平均仅收800斤鲜红芋。”^④1960年初,杨桥公社一名大队书记也抱怨稻改影响了红芋产量,“今年稻改任务不小,去年只让抗旱浇稻,稻子也没全保住,红芋也没栽上,今年我看高产还用高产补,少改水稻,多栽红芋不是一样多收粮食。”^⑤

1960年7月,临泉县委制定的农业生产进度表显示,稻改计划执行较好的宋集、化集两公社,整体农业生产进度却不理想。截止7月15日,宋集已完成全年稻改计划的103.9%,排名全县第一,但春种的完成率只有83.5%,排在全县倒数第二位;夏种情况同样如此,红芋的完成率只有58%,排在第八位。化集稻改完成计划排名全县第四位,春种和夏种却分别排在第九位和第十一位,全年生产计划更只完成76.4%,白(荒)地有60704亩^⑥。稻改虽不是影响农业生产进度的唯一因素,但其完成情况与整体生产进度间的巨大反差,说明稻改优先的策略使得正常的农业生产进度被拖慢。

除了占用其他作物的劳动力,春夏两稻之间也会出现劳动力挤压现象。皖北稻改多分春夏两季,夏稻插秧时正值春稻需水高峰。各地为保证稻改的顺利进行,一般将劳动力分为插秧、保稻两部分,结果往往顾此失彼。1959年,临泉县委为减少保稻劳力,就将提水工具由多人一车改为一人多车,即便如此,保稻仍占去全县劳动力的50%，“全县田间管理的劳力12万人,其中保稻劳力需要6万人。”^⑦在此情形下,照顾春稻就会影响夏稻插秧。1959年,地委在阜南检查时就发现,稻田漏水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不足。“最近几天必须组织劳力突击插秧,并要向队、组干部和群众讲清楚过了‘夏至’水稻就要减产的道理。稻田漏水必须补救。我看田集、张寨、普善一带很多稻田漏水,普善为重。一般得一天一浇,甚至很多劳力调不开。普善大队15号一天有1657人搞水稻,只有300多人去插秧,其余1210人全部在保稻,占整个稻改劳力73%强。”^⑧

稻改对劳动力的过度占用,势必引起农业生产效益的整体下降,并反映于各种农作物单产的降低上。1958年阜阳地区的粮食单产为64公斤,1959年降为51公斤^⑨,降幅达20.3%;临泉的粮食单产也

① 临泉县委:《关于召开公社党委书记跃进会议的报告》(1960年6月19日),临档:3-2-236。

② 地委下放干部工作组、黄岭公社刘火庙大队总支:《临泉县黄岭公社刘火庙大队整风整社工作总结报告》(1961年5月10日),临档:3-2-248。

③ 陈俊岭:《在河南参观情况报告》(1960年6月17日),临档:3-1-262。

④ 临泉县委:《对长官公社单桥大队稻田管理调查报告》(1960年11月4日),临档:3-1-285。

⑤ 临泉县委:《鼓干劲誓夺水稻大丰收,树雄心定把淮北变江南,临泉县稻改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60年3月15日),临档:3-1-285。

⑥ 临泉县委:《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数字表格》(1960年7月15日),临档:3-1-281。

⑦ 临泉县委:《积极采取措施,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完成粮、棉、油生产计划》(1959年6月28日),临档:3-1-197。

⑧ 杨 彬:《关于阜南田集、普善两个大队稻改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16日),临档:3-2-165。

⑨ 《阜阳地区志》,第188页。

由 1958 年的 73 公斤降至 1959 年的 64 公斤,降幅为 12.3%^①。春夏稻之间出现的劳力挤压问题,同样会降低稻改的实际收益。1959 年阜阳地区的水稻单产仅为 64 公斤^②,远未达致预期目标^③。虽然粮食单产的增减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但从前述劳动力占用所致的农事混乱来看,稻改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稻改、荒地与减产

稻改对皖西北各地来说,是一项全新的生产变革,在改变原有种植结构的同时,也打乱了农时安排,影响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亳州在多年后的反思中就认为,稻改面积过大引起的作物布局混乱,使该县 1959 年的粮食产量相较 1955 年下降了 2 亿斤^④,参照 1955 年粮食总产 4.4 亿斤计算,降幅高达 45.5%,相比 1958 年的 4.1 亿斤^⑤,则下降了 48.8%。

不仅亳州如此,1959 年,阜阳地区及所辖各县都出现了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1958 年阜阳地区粮食总产为 41 亿斤,1959 年降至 27.1 亿斤^⑥,年度降幅为 34.1%;临泉 1958 年粮食总产 4.1 亿斤,次年降至 3 亿斤^⑦,降幅也达 26.8%。1959 年的粮食减产虽然未必全是稻改所致,但从前述劳力占用所致的农事混乱来看,稻改的负面影响是确凿无疑的。相较劳动力占用,土地荒芜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导致 1959 年粮食总产下降的诸多因素中,播种面积减少的影响较大。以阜阳地区为例,1958 年粮食播种面积 3228.8 万亩,1959 年降至 2678.1 万亩,1960 年也只有 2689.0 万亩。也就是说,1959 年和 1960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历年最少^⑧。而同期棉、麻等主要经济作物的面积并未出现大幅波动,如 1958 年棉、油、麻、烟、糖五种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合计为 160.3 万亩,1959 年为 176.2 万亩^⑨,年度增加 15.9 万亩,与减少的 550.7(3228.8-2678.1)万亩相比,可忽略不计。这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不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结果。由于同期全区也无较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因此,粮食播种面积的骤降只能从耕地占用或荒芜的角度来解释。

临泉和亳州两县也如此。1958 年临泉粮食播种面积为 282.5 万亩,1959 年降至 237.8 万亩,次年又升至 264.7 万亩,同期油、棉等两种主要经济作物的面积更是逐年下降^⑩;1958 年亳州粮食播种面积为 156.7 万亩,1959 年为 99.8 万亩,次年升至 122 万亩,1959 年的棉花播种面积只有 1 万亩增幅,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幅也不能相提并论^⑪。加之两县当年同样没有较大的行政区划变动,粮食播种面积的骤降也只能归结于可播种面积的减少。

1959 年阜阳地委农工部认为,这一时期粮食可播种面积的减少,主要是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河

① 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泉县志》,黄山书社,1994 年,第 90 页。

② 《阜阳地区志》,第 193 页。

③ 按照 1956 年的纲要要求,皖北地区的粮食单产目标是 500 斤。

④ 《亳州市志》,第 123 页。

⑤ 1955 年和 1958 年的粮食总产依据《亳州市志》中当年小麦、黄豆、玉米、高粱和红芋几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相加而得。《亳州市志》,第 123 页。

⑥ 《阜阳地区志》,第 188 页。

⑦ 《临泉县志》,第 90 页。

⑧ 《阜阳地区志》,第 188 页。

⑨ 此处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是根据《阜阳地区志》中棉、油、麻、烟、糖五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合计计算而得,参见《阜阳地区志》,第 199、201、203、205、206 页。

⑩ 《临泉县志》,第 90 页。

⑪ 《亳州市志》,第 123 页。

网化工程占地,1959年初的全区茬口利用计划显示,当年水利挖压占地多达59.42万亩,临泉和亳州分别为6.95万亩和6.48万亩^①;二是稻改导致的土地荒芜。有关河网化占地,笔者已有另文论述^②,下文将主要讨论稻改的影响。

稻改之所以会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是由于高计划和实播面积的差距,使大量原本安排种植水稻的土地荒芜,这种情况发生在稻改面积急速扩大后。据前文所述,1958年阜阳地区计划稻改面积447万亩,4月末打好田埂348万亩,而当年全区水稻实播面积只有143万亩^③。1959年同样如此,计划定格在450万亩^④,5月初安家定块272万亩,最后实播面积只有179.7万亩^⑤。即便不考虑计划面积,仅以安家定块面积和实播面积相比,两年也分别相差205万亩、92.3万亩。1958年后的稻改近乎是一项政治工程,各地一般都会预留足够的耕地用于稻改。即便任务最终难以完成,预留土地也很难再播种其他粮食作物,就会出现荒地或白地,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粮食播种面积。

前引茬口利用计划显示,1959年阜阳全区预留春地437.94万亩,另有夏稻秧母田120万亩^⑥。4月18日的县委书记会议显示,全区春、白地多达637万亩,其中239万亩是春稻预留地^⑦。如果没有稻改任务,春稻预留地和夏稻秧母田都可种植小麦,二者合计可增加小麦播种面积359万亩。当年小麦单产96斤,仅此一项即可增加粮食3.5亿斤。再以1959年的681.3万人^⑧计算,人均可增加粮食51斤。类似情形在全区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下文以临泉为例进一步说明。

1954年临泉开始稻改,因规模较小,并未出现土地浪费问题。从1958年开始,稻改面积骤然扩大,荒地现象开始出现。1958年1月16日计划显示,临泉的稻改面积是20万亩,^⑨2月底增至27万亩^⑩,并全部“安家定块”^⑪,4月初又增至37万亩^⑫。但11月的县委农工部总结显示,当年全县稻改实播面积只有26.7万亩^⑬,与计划相差11万亩。1959年,全县计划改种水稻56万亩^⑭,后增加到67万亩,仅育秧地就留出11.5万亩^⑮,占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的近10%。在计划多次修订后,最终确定的稻改面积是65万亩,其中春稻33万亩、夏稻32万亩^⑯。不过7月29日的县委会议透露,上述计划仍然未能完成,全县稻改实播面积只有33万亩^⑰,与计划相差32万亩。

虽然由于材料所限,32万亩耕地是否全部荒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959年的秋种计划来看,稻

① 阜阳地委农工部:《1959年茬口利用情况计划表》,临档:121-2-16。

② 葛玲:《“大跃进”时期的水利运动与粮食短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6期。

③ 《阜阳地区志》,第191页。

④ 阜阳地委:《关于当前稻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9年5月5日),临档:3-2-165。

⑤ 《阜阳地区志》,第191页。

⑥ 阜阳地委农工部:《1959年茬口利用情况计划表》,临档:121-2-16。

⑦ 阜阳地委:《四月十八日县委第一书记会议自报春播作物定案表》,临档:3-2-155。

⑧ 《阜阳地区志》,第157页。

⑨ 临泉县委办公室:《县委电话会议记录稿》(1958年1月16日),临档:3-1-149。

⑩ 临泉县委农工部:《关于认真做好稻改工具工作的意见及初步分配提水工具的打算》(1958年2月24日),临档:121-1-26。

⑪ 阜阳地委农工部:《当前稻改准备工作情况与意见》(1958年2月25日),临档:121-2-14。

⑫ 临泉县委农工部:《火速准备好稻改工具》(1958年4月6日),临档:121-1-26。

⑬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年11月17日),临档:121-1-26。

⑭ 临泉县委:《临泉县1959年稻改工作初步打算》(1958年11月30日),临档:3-1-219。

⑮ 临泉县委:《1959年春种安排》(1959年1月7日),临档:3-1-216。

⑯ 临泉县委:《关于修改稻改计划的紧急通知》(1959年4月5日),临档:3-1-219。

⑰ 《临泉县委记录》(1959年7月29日),临档:3-1-172。

改对全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影响极为突出。该计划显示,为安排次年 33 万亩的春稻任务,县里需要留出 32.5 万亩春地^①。按照当地种植习惯,32.5 万亩春地本应种植冬小麦。这就表明,1959 年的临泉稻改,对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影响至少在 32.5 万亩以上。

按照 1960 年 106 斤的小麦单产计算^②,32.5 万亩春地即减少小麦产量 0.3 亿斤,占 1959 年粮食总产的 11.4%,根据 1959 年末的 852019 人计算^③,等于人均减少粮食 40 斤。这还仅是考虑了春地减少对粮食总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稻改计划难以落实所致的土地荒芜,稻改引起的粮食减产量应当更多。事实上,荒地现象很难避免。1961 年地委工作组在刘火庙发现,该村因稻改中的劳力使用不当,出现了 1500 亩土地荒芜的问题^④。1961 年 8 月,赵宋在检查中也特别指出,1958-1959 年全县因为稻改导致 20 多万亩土地荒芜^⑤。

由以上的讨论可见,稻改不仅会因预留春地直接导致小麦播种面积减少,还会因计划难以落实使预留耕地成为荒地,进一步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这点无论在阜阳全区还是临泉一县,都是如此。就 1959 年的粮食减产而论,稻改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稻改、减产与饥荒

在任何地区,口粮减少都是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导致口粮减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层面的粮食产量降低;一是分配层面的粮食征购量增加。从阜阳地区的情况看,1958 年至 1960 年的粮食征购逐年下降:1958 年 14.1 亿斤、1959 年 12.2 亿斤,1960 年 8.4 亿斤^⑥。临泉和亳州的情形类似,两县 1958 至 1960 年的粮食征购量分别为 1.9 亿斤、1.5 亿斤;1.2 亿斤、1.3 亿斤;1.0 亿斤、0.7 亿斤^⑦。由此可见,饥荒期间阜阳农民口粮减少的主要原因并非征购量的增加。如果口粮减少的结果主要系征购所致,那么饥荒最严重的时间应是 1959 年而非事实上的 1960 年。这说明在阜阳地区,征购不是引发饥荒的直接因素,生产环节的粮食减少更为主要。

就阜阳全区的情况看,1959 年确是饥荒时期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全区 1958 年的粮食总产是 41 亿斤,1959 年降至 27.1 亿斤,1960 年又回升至 28.6 亿斤^⑧,1959 年的粮食总产年度降幅达 13.9 亿斤,以当年底的 681.3 万人计算^⑨,相当于年度人均减少粮食 204.6 斤。这进一步说明,导致阜阳成为安徽饥荒重灾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环节的粮食减少。

上文所引阜阳地区各个年度的粮食产量和征购量,均出自《阜阳地区志》。有关地区志中粮食产量和征购量数据的可靠性,笔者据档案记载稍作说明。《阜阳地区志》记载 1957 年的产量为 42.3 亿斤^⑩,

① 临泉县委:《临泉县 1959 年秋种初步计划》(1959 年 9 月 9 日),临档:3-1-218。

② 《临泉县志》,第 90 页。

③ 《临泉县志》,第 73 页。

④ 地委下放干部工作组、黄岭公社刘火庙大队总支:《整风整社工作总结报告》(1961 年 5 月 10 日),临档:3-2-248。

⑤ 赵宋:《代表县委对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的(初步)检查》(1961 年 8 月 18 日),临档:3-1-316。稻改所致的土地荒芜,梁志远在回顾亳县稻改时,也指出了类似问题。参见梁志远:《亳县“早粮改水稻,淮北变江南”的失败》,《江淮文史》2011 年第 3 期。

⑥ 《阜阳地区志》,第 492 页。

⑦ 《临泉县志》,第 187 页;《亳州市志》,第 248 页。

⑧ 《阜阳地区志》,第 188 页。

⑨ 《阜阳地区志》,第 157 页。

⑩ 《阜阳地区志》,第 188 页。

1957年8月22日的安徽省粮食购销计划显示, 阜阳地区当年上报的产量是52.2亿斤^①, 1961年12月地委的七年粮食规划透露, 1957年的粮食实产是42亿斤^②, 与地区志中的数据吻合。

关于征购量, 以1958年的情况说明。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 地区志记载是14.1亿斤^③。1958年8月5日的地委报告透露, 当年省分配任务是13.2亿斤, 地委在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后增加了17.4%, 这样分配各县任务就增加至15.5亿斤^④。11月24日, 安徽省粮食厅的报告显示, 阜阳13.2亿斤的征购任务超额完成^⑤。但12月29日的地委指示显示, 由于省里上调了当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阜阳地区的新任务为19.0亿斤^⑥, 地委分配各县任务也上调至22.1亿斤, 并指出当时已完成15.5亿斤^⑦。不过1959年2月的另一份指示却表示, 1958年全区征购实际入库数为14.5亿斤^⑧, 接近地区志记载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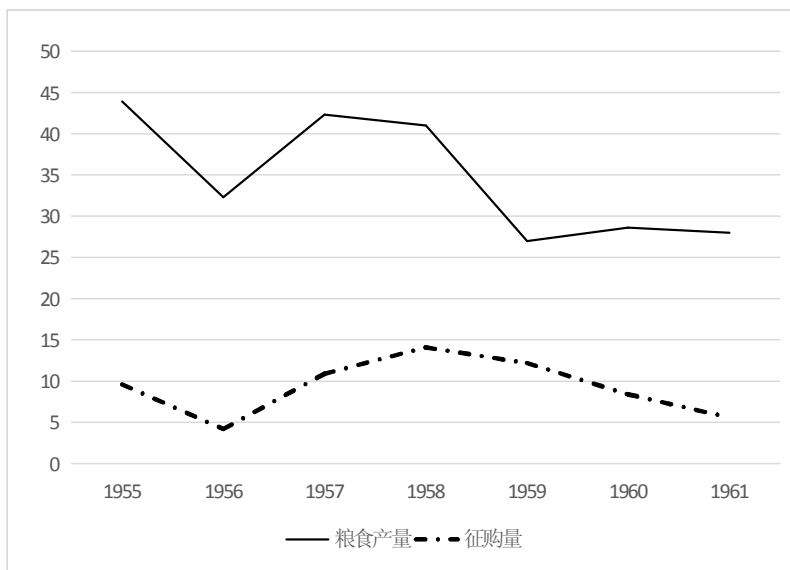


图1 1955-1961年阜阳地区粮食产量和征购量变化 单位: 亿斤

由1957年的产量和1958年的征购量来看, 地区志记载的粮食数据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的档案数据基本吻合, 相较而言更具可靠性。在缺少更为完整的档案资料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 可以将地区志中的粮食数据作为本文的讨论基础。图1即据此绘制而成。

在不考虑统销粮的前提下, 图1中两条折线间的距离反映的是年度粮食留存情况。距离越远, 意味着留粮越多, 反之越少。由图1可见, 1955-1961年期间, 1959年的农村留粮是历史最低值。这种情形也反映在了图2中的人均留粮变化上。

① 安徽省委财贸部:《安徽省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粮食征购、销售计划意见》(1957年8月22日), 临档:3-2-116。

② 阜阳地委农工部:《七年规划粮食指标(草案)》(1961年12月14日), 临档:121-2-27。

③ 《阜阳地区志》, 第492页。

④ 阜阳地委财贸部:《为贯彻省委1958年7月5日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粮食购销差额基数的调整意见和关于购销差额包干办法的报告”的报告(草案)》, 临档:3-2-143。

⑤ 安徽省粮食厅:《关于目前粮食工作情况的报告》(1958年11月24日), 临档:3-2-143。

⑥ 阜阳地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紧急指示》(1959年2月3日), 临档:3-2-169。

⑦ 阜阳地委:《阜阳专区五八年粮食征购任务完成进度检查表》(1958年12月29日), 临档:3-2-143。

⑧ 阜阳地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紧急指示》(1959年2月3日), 临档:3-2-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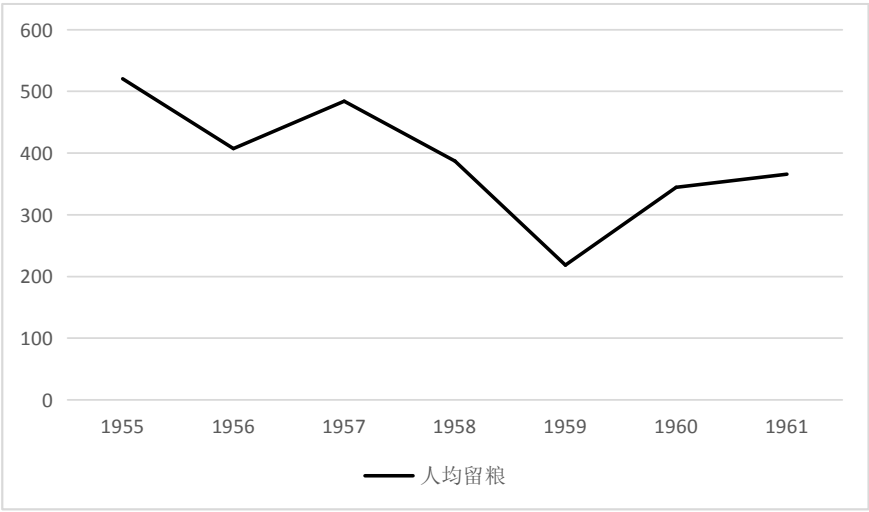


图 2 1955-1961 年阜阳地区征购后人均留粮变化^① (单位:斤)

值得关注的是,图 1 中 1959 年粮食产量和征购量折线的接近并非同时趋近,征购量折线甚至出现轻微下行,两线的趋近主要是产量折线的急剧下行所致。这说明,在 1959 年粮食留存总量和人均留粮量下降的因素中,产量相较征购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人为和自然两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指各种气象灾害,这种影响的最直接反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从阜阳的情况看,1958 年粮食单产为 128 斤,1959 年为 102 斤,1960 年为 106 斤,结合年度播种面积 2678.1 万亩和 2689 万亩,1959 年和 1960 年单产下降导致的粮食减产分别为 7.0[(128-102)×2678.1]亿斤、5.9[(128-106)×2689.0]亿斤。

不过要指出的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并不全是自然灾害所致,前文中稻改对劳动力的过度占用,同样会导致粮食单产的下降。受材料所限,灾害和人为因素在 1959 年单产下降中的占比,难以严格区分,因此本文姑且不论。本文主要讨论 1959 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对当年粮食总产下降的影响。1958 年阜阳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3228.8 万亩,1959 年和 1960 年分别减少了 550.7 万亩和 539.8 万亩,以此减少面积乘以年度粮食单产,可得出两年播种面积减少所致的减产量分别为 5.6 亿斤、5.7 亿斤^②,和前述的单产影响量相加,基本吻合年度粮食减产总量。

临泉的情况与此类似,1959 年全县因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导致粮食减产 0.6 亿斤^③。按照 1959 年底 852019 的人口总数计算,相当于人均减少 67.1 斤^④。亳州如按照 2.0 亿斤的减产量计算,年度人均减产达 270.4 斤^⑤。因此无论阜阳全区,还是临泉、亳州两县的情况,都足以说明粮食减产是饥荒发生的最重要原因,且在导致粮食减产的因素中,播种面积减少又位居其一。

前文已述,稻改是导致 1959 年阜阳地区及各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两大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认为,稻改是阜阳饥荒发生的主要因素。其中稻改中的劳动力占用,因扰乱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稻改占地或荒地则会带来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并最终影响到粮食产量。有关稻改和

① 人均留粮由年度粮食产量扣除征购量除以当年人口得出,人口数据来自《阜阳地区志》,第 157 页。
 ② 文中所得的粮食减产量主要根据当年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计算而来,详见《阜阳地区志》,第 188 页。
 ③ 文中所得的粮食减产量主要根据当年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计算而来,详见《临泉县志》,第 90 页。
 ④ 《临泉县志》,第 73 页。
 ⑤ 亳州 1959 年底的人口为 750560,《亳州市志》,第 75 页。

饥荒间的因果关系,反映于各县稻改面积在粮食播种面积中的比重及其和饥荒程度的关联上。表1体现了这种关联。

表1 1959年阜阳地区各县稻改面积比重及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

县别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稻改面积(万亩)	稻改面积占粮食面积的比重(%)	排名	死亡人口	人口死亡率(‰)	排名
太和	204.2	62	30.4	1	148969	163.3	1
临泉	271.2	69	25.4	2	71392	85.2	5
阜阳	350.6	75	21.4	3	134128	118.3	3
阜南	247.1	48	19.4	4	39615	57.7	8
凤台	236.2	45	19.1	5	44480	92.6	4
颍上	241.5	46	19.0	6	40190	58.5	7
涡阳	335.0	61	18.2	7	54088	59.3	6
亳州	274.0	47	17.2	8	100807	146.0	2
蒙城	313.7	47	15.0	9	34447	54.4	9

说明:

- (1)表中1959年各县粮食播种面积取自阜阳地委:《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指标的通知》(1959年4月24日),临档:3-2-165。因1959年太和、界首两县短暂合并,故原文中的两县播种面积合为一项,由于未能查到当年界首的稻改面积,故此处所引太和部分为首太县减去界首的100.5万亩所得。
- (2)为了考虑到稻改产生的荒地问题,本表所列稻改面积不是各县的实播面积,而是地委下达的计划面积。由于稻改分春夏两季,夏稻种植也要在春季留出秧母田,故此处引用了1959年初留种计划表中的数据。由于原表缺少界首的数据,所以上表也暂未列入。
- (3)各县人口死亡情况参考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478-479页。需要说明,表中的人口死亡主要是1960年数据,并非整个饥荒期间的各县人口死亡情况。

阅读表1不难发现,太和、阜阳、蒙城三县稻改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在九县中的排名,与人口死亡率排名完全重合。其中,太和稻改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全区最高,人口死亡率也属全区最高;蒙城的情况反之,稻改比例最低人口死亡率也最低。颍上、涡阳两县两项数据排名相互对调,基本相符。临泉的稻改面积占比排名第二,人口死亡率居全区第五;凤台稻改面积占比排名第五,人口死亡率也排在第四。

阜南和亳州两县的情况比较特殊,这里稍作说明。阜南县是全地区仅有的既有水稻种植经验,又有少量水田的县份,是全区稻改自然条件最好的县。相较而言,稻改对该县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应为全区最低。亳州的情况正好相反,该县既无稻谷种植经验,又是最不具备稻改自然条件的县份,稻改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由于稻改与人口死亡间的关联,除考虑稻改面积占比外,还要结合各县的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因此阜南和亳州的特例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表1所见的整体情形而论,稻改和人口死亡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存在的。这也说明,稻改是皖北各县间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

下文再以临泉分公社的稻改面积和人口死亡情况作进一步分析。表2是1959-1960年临泉分社稻改面积、土地荒芜及人口死亡情况,据此可直观看出稻改与饥荒的关系。

表 2 1959 年临泉各公社稻改面积比重及 1959–1961 年的人口死亡率

公社	粮食播种面积 (亩)	稻改面积 (亩)	稻改面积占粮食 播种面积的比重(%)	排名	人口死亡率 (‰)	排名
宋集	230090	71000	30.9	1	321.2	1
化集	263338	79500	30.2	2	290.5	2
黄岭	205443	52900	25.8	3	184.4	8
艾亭	252401	60100	23.8	4	205.0	5
姜寨	187322	44480	23.8	5	273.1	3
同城	209022	48800	23.4	6	189.4	6
迎仙	226550	52200	23.0	7	186.7	7
老集	274970	62360	22.7	8	136.4	9
杨桥	250022	54900	22.0	9	109.7	11
城关	188588	40400	21.4	10	124.8	10
长官	178957	38000	21.2	11	236.0	4

说明:

- (1)表中各公社 1959 年粮食播种面积是午季面积和秋季面积相加所得,其中午季作物面积来自临泉县委农工部:《全年粮食作物收入分配预算表》(1959 年 9 月 20 日),临档:121-1-36;由于作此预算时,秋作物尚未完全播种,故秋作物面积未取自该表,而是采用了 1959 年底的农工部秋作物受灾定案统计,临泉县委农工部:《秋季作物受灾程度定案表(面积)》(1959 年 12 月 17 日),临档:121-1-41。
- (2)考虑到春稻播种和夏稻育秧都要事先留出耕地,为将此影响考虑在内,稻改面积采用了 1959 年初的数据,4 月最终确定的稻改面积与此基本相符。详见临泉县委:《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计划》(1959 年 1 月 6 日),临档:3-1-216。
- (3)人口死亡率参见葛玲:《天堂之路:1959–1961 年饥荒的多维透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62 页。

从表 2 可见,宋集、化集、同城、迎仙四社稻改面积在其粮食播种面积中的占比排名,与四社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排名完全重叠,其中宋集、化集是全县饥荒最严重的两个公社。艾亭、姜寨、老集、杨桥、城关五社的稻改面积在粮食播种面积中的占比排名,与其人口死亡率排名虽未完全重叠,也仅是相邻之间的变化,并未出现太大的偏离。考虑到影响人口死亡的原因并非稻改一个,此种细微变化可以理解。比如姜寨就因救灾迟缓,加重了饥荒程度,老集虽属县委认定的四个重灾区之一,却因最早得到救济而降低了人口死亡率^①。例外的是长官和黄岭,长官人口死亡率排全县第四,稻改面积占比却排在全县最后一位,说明长官的人口死亡,在稻改之外应该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由于长官辖下的单桥曾被树为全省河网化的典型,可以推测在引发长官饥荒的诸因素中,河网化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②。黄岭的情况则相反,该社稻改面积占比排名第三,人口死亡率只排第八,同样表明稻改在该社人口死亡中的影响不如其他公社明显。

稻改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既反映了受稻改影响的粮食减产幅度,同时也能间接体现稻改占用的劳动力状况。如果稻改是饥荒发生的重要因素,那么稻改占比越大,其所导致的饥荒程度就会愈加严重。从表 1 中阜阳地区各县情况及表 2 中临泉各公社的情况看,上述结论是成立的。

① 葛玲:《天堂之路:1959–1961 年饥荒的多维透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84–188 页。

② 临泉县委:《临泉县单桥乡河网化总结》(1958 年 10 月 22 日),临档:3-1-158。

五、结 语

本文的研究发现,阜阳之所以成为安徽饥荒重灾区,粮食征购的影响并不突出,产量减少更为主要。而考察 1959 年前后的粮食生产情况,单产降低和播种面积减少又是总产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影响粮食单产的各种因素中,虽然自然灾害的作用不能忽视,但稻改中的劳动力过度占用,同样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并体现于粮食单产的下降上。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各种因素中,稻改的影响非常关键,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土地荒芜。

稻改中荒地情形的出现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为了春稻种植,各地需在冬作物(主要是冬小麦)播种中留出“春地”准备种植春稻,从而减少了冬季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再者,由于大跃进时期的高计划难以落实,加之各地无法预计最终结果,因此一般会留足计划中的稻改用地,以致计划和落实出现差额,从而导致土地荒芜,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总之,稻改因劳动力占用和土地荒芜导致了 1959 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引发了饥荒。阜阳各县及临泉县各公社稻改面积与人口死亡之间的对比分析,表明稻改是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稻改在皖西北饥荒发生中的关键影响,显然有别于刘诗古研究的无为。这说明,行之全省的政策因为在地方的不同表现,会产生完全相异的后果。就“三改”而言,这种差异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在皖南各地,“三改”的主要表现是“单改双”,体现为“茬口安排”,并未从根本上颠覆当地的传统种植结构和习惯。而在皖北地区,以“稻改”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三改”,是彻底的生产变革,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和习惯。在皖北“三改”的推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官方强力推广与底层抵制间的博弈,带有鲜明的政治强制性。尤其是在大跃进期间,“三改”演化为政治工程后。最终,“三改”的粮食增产之效不仅未能实现,反因官方计划逐渐脱离地方实际而出现土地荒芜,成为饥荒发生的关键因素。

虽然如稻改这样的地方性政策在饥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区域性饥荒的发生,完全是地方政策行为的结果。稻改虽在皖北成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地方工程,在其政策历变中却清晰可见中央的影响,比如 1956 年中央粮食增产目标的提出,就对稻改的定位之变发挥了明显的助推作用,大跃进更是遍行全国之事。因此,任何地方性饥荒的发生都无法离开整体历史背景的讨论,不能因强调饥荒的差异性而陷入“地方主义”的泥沼。当然也不得不说,在讨论各地的饥荒差异性时,地方因素确实更具有解释力。亦如皖北的稻改,虽有宏观政策背景,主要还是地方工程,甚至同一个“三改”政策,皖南皖北的表现就截然不同。这说明,饥荒的发生虽有相同的政策背景,各地的差异性也体现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即便是对饥荒发生的整体理解,也需要建立在一个个实践逻辑累积的基础之上。

[本文是在笔者博士论文《天堂之路:1959-1961 年中国饥荒的多维透视》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而成,写作中得到导师韩钢教授的悉心指导,论文修改阶段蒙曹树基教授提出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李庆刚. 近几年“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 (1).
- [2] 范子英, 孟令杰. 有关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的研究综述[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 (2).
- [3] 刘诗古. 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J]. 学术界, 2012, (4).
- [4] 葛 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皖西北稻改运动的初步研究——以临泉县为例[J]. 中共党史研究, 2011, (3).
- [5] 葛 玲.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运动与粮食紧张[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4, (6).